

1978年是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之年，党和国家进入了以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主要任务的历史新时期。

具备自我教育能力的中国人，

几乎都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从这一角度去看，

这本书还是写教育的书。

试想，每一位中国人都具备了自我教育能力，

中国梦还会不能实现吗？

我的 1978

郑正辉◎著



CS 湖南人民出版社

我的1978

郑正辉◎著

CS 湖南人民出版社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1978 / 郑正辉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1

ISBN 978-7-5561-0684-4

I. ①我… II. ①郑… III. ①自传体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17419号

我的1978

编 著 者 郑正辉
责任编辑 肖贵飞 杨丁丁
特邀编辑 朱碧倩 蒋科兰
编辑部电话 0731-82683328 82683306
装帧设计 杨丁丁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5年2月第1版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224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61-0684-4
定 价 28.00元

营销电话：0731-8268334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

序 言

※ Preface ※

自我教育决定成功

李长廷

我跟正辉相识于 20 世纪 80 年代。那时，他刚大学毕业，在地区群众艺术馆工作，我在宁远县文化馆工作。后来，他到地区文化局工作，我到地区文联工作，同在一个院子里办公，几乎天天见面，谈论文学，憧憬未来。那时，他对文学深切迷恋，时常发表短篇小说、散文等作品，却无有影响的作品问世。沉寂多年之后，他的佳作连续出版。2011 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他的长篇小说《对决》；2013 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他的长篇小说《博士生》；今年 8 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他的家庭教育长篇叙事作品《“坏”爸爸造就好孩子》。据报道，这本书列入了 2014 年度世纪出版集团重点图书，《新民晚报》专题推介。在 2014 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活动周，举行新书发布会，并请正辉到现场签名售书。相距不到半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又将出版他的《我的 1978》，可喜可贺！

令我惊奇的是，正辉宁愿放弃美好的仕途而痴情于文学，而且，二十几年来，他的才情和文体一直没有变化过。他那涌泉般的激情，幽默睿智的文字，对文学独特的理解和诠释，犹如滔滔江河水一般奔腾不息。我很喜欢他的写实主义风格，既蕴含现实主义的基调，又闪耀现代主义的灵光。他一直秉承马克思主义“人是社会的总和”的理念，注重刻画人，善于刻画人，把所写的人置于波澜壮阔的现

实社会环境之中描绘，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近距离描绘现实生活中的各色人物，对人的自私、欲望、孤独有着精确的剖析，让读者感受到萨特的存在主义对他的影响。如长篇小说《对决》中的人物牛置信、马志良；《博士生》中的周云龙、孙立群，都算得上是文学人物长廊中的典型形象，让人过目不忘，引人深深自省。

正辉写的都是教育题材，《对决》、《博士生》，描述当前大学的现实生活。前者讲述一所专科学校在专升本之际，发生的人事变换；后者讲述一所重点大学的博士生导师申请重点课题的辛酸历程。《“坏”爸爸造就好孩子》和《我的1978》也是写教育，两本书都是写正辉自己的亲身经历，前者讲述他如何培育自己的儿子成才，后者讲述他自己如何通过自学，小学肄业考上大学。

虽然我当过几年乡村教师，但之后长期从事文化工作，对教育的认知不深。以一位父亲的身份和经历过1978年以前的生活的农村人的身份去体验，《“坏”爸爸造就好孩子》和《我的1978》这两本书给我的感受，可以用两个词来形容：新奇、震撼。

新奇之感来自《“坏”爸爸造就好孩子》一书。正辉教育儿子不按常理出牌，儿子上学之前，不教儿子识字，不让儿子上学前班，每天带儿子四处游玩，跟儿子编创故事。儿子上学之后，他不辅导儿子功课，不鼓励儿子考第一名，儿子考了第一名父子打架，儿子犯了错误给予奖励。任由儿子凭自己的爱好行事，任由儿子凭自己的兴趣选择；任由儿子放弃全省一流的师大附中就读的名额；任由孩子十四岁阅读《性的知识》，用常人不敢想的方式开启对儿子的性启蒙和性教育。父子俩没大没小，他喊儿子喊伙伴，儿子喊他则喊伙计。

在一般人看来，这样教育孩子绝对是不负责任、不顾孩子的美好前程的坏爸爸所为。事实证明，正辉的教子经行之有效，效果辉煌。父母轻松潇洒，孩子健康快乐、学习自觉、积极上进、品德高尚。他儿子轻松考上国内名牌大学，又考上世界顶尖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博士研究生，现已获得博士学位，在美国IBM公司工作。我是看着他儿子长大的，他的教子经还是令我颇感新奇，不得不服。

震撼之感来自这本《我的1978》。在读这本书之前，我知道正辉小学肄业考上大学，不知道他经历过这么多苦难，也不知道他有如此宽广的胸怀和高尚的情操。

正辉生长在农村。由于家庭成分是富农，12岁时，他读小学五年级，被赶出了教室，在生产队当半劳力。他酷爱读书，在当农民的11年当中，几乎每天晚上躲在帐子里，对着豆粒大的煤油灯光看书。11年看了30多本书，方圆十几里的书几乎都让他借来看了。借不到书的时候，他读《毛泽东选集》，把《毛泽东

选集》一至四卷先后通读了四遍。这本书中的《书桌》《借书》《追书》《赖书》四个连续章节，把他对读书的渴望、借书时的窘迫、读书时的欢欣，描述得淋漓尽致，让人拍案叫绝。《我的初恋》《恋人变媒人》《温暖的草树》《未寄出的情书》四个章节，把他对爱情的理解、向往和珍惜，以及他的高尚情操和人间冷暖，表现得荡气回肠，令人心灵震撼，肃然起敬。

《我的1978》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台湾的一部电影《汪洋中的一条船》。那部电影改编自郑丰喜的自传体小说。郑丰喜先天身患小儿麻痹症，双腿残疾，差一点被家人抛弃，幸而爷爷与二婶等人的呵护与庇护，才得以新生，并从艰难困苦的人生境遇中成长起来。郑丰喜是因为身体残疾、家境贫寒，受世人歧视。正辉则是因为政治因素，被当时的社会所遗弃，跟郑丰喜相比，心灵遭受的折磨有过之而无不及。跟郑丰喜一样，正辉没有沉沦，而是依靠自己的努力，从艰难困苦的人生境遇中成长起来。

对自己的遭遇，正辉超然大度，乐观面对，没有抱怨。笔下的童年天真烂漫，妙趣横生；苦难的青少年时代，仍让他描绘得充满温馨和希望，处处闪耀人性的光辉。书本知识和人间真情让他树立起了坚强的信念，他认为，“真正能激起人振奋的不是苦难，而是人类之间的大善和大爱”，“我总是依靠相识和相处的所有人的善意”。正是这种信念支撑他在常人不敢想象的困苦岁月中，坚持自学11年，1978年，考上大学。如果他心中没有信念，没有相识和相处的人的善意呵护，没有从读书学习过程当中感受快乐，他不可能考上大学。按当时农村小学的教学水平，一个只读过五年农村小学的人考上大学，不得不说正辉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奇迹。

这本书让人认为是励志书，正辉却坚持说是写教育的书。他说，他之所以能考上大学，是因为他自己教育了自己。他的成功正是体现了教育的本质，教育的本质就是让受教育者具备自我教育能力。他还说，他教育儿子不按常理出牌，就是从自己的切身体会中总结出来的教育理念：真正的教育是通过自我教育而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自我教育决定成功。他不按常理出牌，其目的就是培育儿子的自我教育能力。

乍一听这话，我有点茫然，直至在网络上无意之中读到一段话，我才恍然大悟。那句话说：“真正有效的教育自我教育。我根本就怀疑‘培养’这句话。梵·高谁培养他？齐白石谁培养他？”

我不怀疑“培养”这句话，但我知道梵·高没有谁培养他，齐白石没有谁培养他，郑正辉也没有谁培养他。

于是，我相信了“自我教育决定成功”这句话，相信了这是一本写教育的书，但我更相信这是一本写梦想的书。

1978年是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之年，党和国家进入了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主要任务的历史新时期。具备自我教育能力的中国人，几乎都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从这一角度去看，这本书还是写教育的书，试想，每一位中国人都具备了自我教育能力，中国梦还会不能实现吗？

是为序。

2014年12月

目 录

※ Contents ※

- 引 子 / 001
- 1. 看火车 / 004
- 2. 捡萝卜皮 / 008
- 3. 我的小学 / 012
- 4. 给别人做儿子 / 019
- 5. 郑家村 / 024
- 6. 热芋头打狗 / 030
- 7. 山雨欲来 / 035
- 8. 在劫难逃 / 043
- 9. 苦中作乐 / 047
- 10. 再度失学 / 053
- 11. 父亲的绝招 / 057
- 12. 逃难 / 066
- 13. 抓阉当坏分子 / 077
- 14. 羊油 / 081
- 15. 半劳动力 / 087
- 16. 书桌 / 092

17. 借书 / 095
18. 追书 / 101
19. 赖书 / 109
20. 哥哥的婚事 / 115
21. 化学原料罐 / 121
22. 想找老婆啦 / 124
23. 我的初恋 / 129
24. 恋人变媒人 / 138
25. 温暖的草树 / 146
26. 未寄出的情书 / 152
27. 《石头记》 / 159
28. 自学木工 / 170
29. 竹篮打水 / 177
30. 考上大学 / 181
31. 如愿以偿 / 188
32. 坚冰消融 / 192

引子

人生的不幸，悲哀的不是生活贫困，不是亲情分离，也不是时刻担心性命不保，而是我所经历的那种难以言说的心灵上的痛苦。我的不幸足以使许多正常人变得不正常，成为精神病。我没有成为精神病人，反而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是因为我自己拯救了自己。

我一直想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却一直没有动笔，认为微不足道。遭受过我那种不幸的人千千万万，小学肄业考上大学的也绝非我一人。

2012年5月，儿子和儿媳从美国回永州举办婚礼，三个侄子分别从上海和北京赶回来参加婚礼。婚礼后的第二天，我带领儿子、儿媳和侄子、侄媳去给我父母上坟。

我父母合葬在天安公墓。伫立在父母的墓前，看看身边肃立的儿子、儿媳和侄子、侄媳，凝视墓碑上父母的遗像，我心情沉重，泪水夺眶而出。

父亲的遗像是我的一位同事照的。那是1991年，父亲73岁，肝癌已到晚期，生命薄如雪花。他身高一米七五，瘦到不足100斤，倚在我家阳台的纱门上，照下最后一张相。快门按下之前，我一再鼓励他：“放松，笑一笑，保持不动，现在可以了。”

照片冲洗出来，却不可以。他老人家脖颈伸长，嘴唇抿紧，两眼瞪圆，一分来长的花白胡须一根根竖立起来，枯瘦的脸上一副惊惶而略显愤慨的表情。

母亲的遗像是大侄子用傻瓜照相机照的。母亲喜欢照相，会照相。她头戴黑色绒帽，帽檐下的花白头发纹丝不乱，满面慈祥的笑容。

父母的遗像是公墓工作人员将两张单帧照片经电脑合成，烤制成瓷像嵌于大理石碑上的。这张“合影”一面世，滑稽效果就出来了，让人疑窦丛生：老大爷老太太怎么啦？照相之前吵过架？子孙不争气？老太太将老大爷的心爱之物毁坏了？不论见者如何猜测，结论肯定一致：这对老夫妻一辈子没有幸福过，瞧那老

头！

父亲并非怯阵拍照才有如此表情，在家中，他似乎就是这副神情。父母在世时，我从来不曾问过二老是否幸福，这一念头也未曾在我头脑中掠过。凝视双亲的遗像，我才认真思考这一问题，却又寻觅不到答案。

父亲逝世的10年前，笼罩于我们家庭的乌云已经散尽，家庭和睦，子孙争气。他老人家逝世之时，他的两个儿子，一个1964年大学毕业，在大学当教师；另一个小学肄业考上大学，在政府机关当公务员。他的四个孙子，老大考上北京大学，老二考上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老三、老四学习成绩一流，不比两个哥哥差，他没有理由不感觉幸福？

我想，或许是父亲惶恐度日30年，心有余悸；或许是我跟他的恩怨他始终积蓄于胸，一切陈年旧怨让他终生难以释怀，才留存这般表情铭刻在墓碑之上。

我出生于农历六月，那年大旱。我一出生，父亲就顺乎自然地将我取名旱生。看看取的这名字，就知道父母对我没抱什么希望，并预见我将会多灾多难。事实果真如此，父母最大的意愿居然是把我送给别人做儿子。我也认为我应该去做别人的儿子，却想不到去做谁的儿子，只能将希望寄托在父亲身上，满怀希望等待父亲宣布好消息。等啊等啊，等了差不多20年，我也没有等来父亲的好消息。

1978年，我考上大学。离家的前夜，父母陪我喝酒，我们光顾高兴，没有回首往事。我们的往事是常人所不能想象的苦难，不堪回首。父母跟我在城里生活的岁月里，我们小心翼翼地捂住那段往事，三个人当中有谁不经意提起，马上被另外两个人岔开，专拣眼下美好的事情来说。谁都知道彼此心上的创口在暗夜里渗血。

母亲于2003年去世，享年86岁。去世之前，她瘫痪在床六年。第五年，她患上了老年痴呆症。从此，她孤独地躺在床上，挣脱了一切羁绊，自由自在地出入时光隧道，零零碎碎地拾捡过去的故事。

一天，我到床边去服侍母亲解手。忽然，她两眼光芒闪闪地望着我，欢喜地道：“明天，‘爷爷’带我去庵子里拜忏。”

母亲所说的“爷爷”是她父亲。我们家乡老辈人的称呼特别奇怪，叫父亲叫“爷爷”，叫母亲叫“姐姐”。不知是否包含了根深蒂固的老夫少妻的隐秘情结。

母亲身后的弟妹相继夭折，她“爷爷”将希望寄托在菩萨身上，热衷于佛事。我至今不清楚什么是“拜忏”，从母亲讲过的故事当中，却知道那是隆重而虔诚的事情，热热闹闹，有吃有耍。也是母亲最幸福的时光，跟随她“爷爷”去“拜忏”，她可以不放牛，可以不砍柴，可以吃巴掌大一块的油豆腐。跟随母亲的思绪回首

往事，我省悟到自己已经漫不经心地扔掉了自己的过去，并深切地感悟到自己不了解父母的过去，不寒而栗。

每次肃立在父母墓前，我都心情沉重，喃喃自语，向父母报告家中的近况，目的是让九泉之下的父母将他们的过去与我们的现在连接不断。

这一次也不例外，我告知父母，你们最小的孙子从美国回来结婚，你们的孙媳也是留美毕业。我想，要是人能够起死回生，一听见我的话，父母肯定即刻从坟墓里跳出来，抱住我们哈哈大笑，笑得泪流满面。他们费了那么多的心思，甘愿忍受亲子分离的痛苦也没能让我读上书。他们的四个孙子，老大是北京大学博士，老二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博士，老三是清华大学博士，最小的孙子是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的博士。四个孙子都是中外顶尖大学的博士，他们能不跳出来笑吗？能不热泪盈眶吗？

离开父母的墓地，我省悟到自己不仅丢掉了父母跟我的过去，随着电话、电子邮件、微信和视频聊天的兴起，还没有留住自己跟子侄们的现在，心里不觉掠过一丝寒意。这时此刻，我才真正下定决心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目的不是炫耀自己的苦难，不是彰显自己的才能，也不是激励后人。我一直认为苦难不是财富，而是不可揭开的伤疤；不是对人成长的磨炼，而是对人心灵的摧残。真正激人振奋的不是苦难，而是人类之间的大善和大爱。用苦难激励后人，是看不到未来的无能之举，是自欺欺人的无奈之举。

如果要讲人生有什么意义和价值的话，我认为，人生最大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对人类发展承上启下的责任感。一个人的生命不是以从摇篮到骨灰盒这段时间来界定的，而是数代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接不断的漫长历程，是一条环环相扣的链条，其中一环断裂了，就连接不起家族、连接不起人类了。要是跟我母亲一样，患上老年痴呆症之后才试图将三者连接起来，那太可怕了。能拾捡起来的只能是一小团、一小团无法理清的乱丝，一小块、一小块无法拼接的碎片。

从公墓回来，我坐在电脑前，决心把我的经历讲述出来，把我跟父亲的恩怨讲述出来，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接起来。告诉子侄，他们的祖辈和父辈的过去，告诉他们那些对他们来说感到不可思议的故事，告诉他们在地球村出现之前，人们是如何生活的。

我也告诉人们，真正的教育是通过自我教育而实现的，一个人能否成才主要取决于自我教育成功与否。自我教育既是教育的本质要求，又是受教育者自我综合能力的体现。我就是通过自我教育而成才的，我的子侄们都是通过自我教育而成才的。

1. 看火车

1959年，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已经从“按需分配”沦落到“按人分配”。五岁的我一餐只有一两二钱米的定量，稀稀的小半钵饭，加一勺没放油的菜叶子汤，没几口就吃喝光了。饭钵一丢，我又哭又闹，抢过母亲或者小姐姐手上的饭钵。

暑假，父亲回家看到这样的形势，冷静地评估了一番，一把将我拉进怀里，对母亲说：“留着这家伙会让你和巧珍饿死。”

母亲苦笑道：“不留着，杀了他煮了吃？”

我咯咯笑起来。巧珍也笑。巧珍是我的小姐姐，比我大四岁。她天天在野地里挖葛根、找野菜。父亲用手当刀，在我后颈窝上来回“杀”了几刀，“杀”得我笑岔了气。

“我带他出去吧？”父亲叹息着跟母亲商量。

那年代，粮食由户口所在地分配。虽然父亲吃的是国家粮，但一个月只有25斤大米，根本没有办法养活我。

母亲担心地问：“你给他吃什么？”

父亲笑眯眯，豪壮又略显生气地道：“你还怕我饿死你儿子！”

当时，父亲在高溪市肖家小学教书。高溪市不是城市，是乡镇。永州有许多乡镇号称市，紫溪市、芦洪市、石期市、白牙市、蔡市、码市、竹市、水市、火市、土市……共有十几个，有一个乡镇还号称总市。高溪市坐落在湘江江畔，湘桂铁路从镇边经过，在此设有一个三股道的小站，每天有一来一往两趟慢车在这里各停靠两分钟。高溪市距离我们村约40公里，我父亲带我先步行20公里到冷水滩，再坐火车到高溪市。

1960年，冷水滩建市。随着大跃进偃旗息鼓，市号被撤销，存活了不足三年。唯一一条现代街道修了不足三百米随之停工，1984年恢复县级市建制才恢复建设。现在是永州市府所在地，一座现代城市。湘江从城中蜿蜒而过，跨江大桥连接两岸，

江畔高楼林立。

当年，河东是不毛之地，河西是拥挤低矮的瓦房，足有上百栋。我们村子周边最大的村庄不足30户人家，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到那么大的“村子”，第一次看见奔流不息的大河，兴奋得蹦跳，冲从对岸慢悠悠划过来的渡船大喊大叫，恨不得长出翅膀飞过江去。坐上渡船，被父亲紧紧搂在怀里，我仍然激动得手舞足蹈，不停地转动脑袋观赏岸上的瓦房，欣赏它们在水中的倒影。船没到江心，我就头晕目眩了。

上岸后，我央求父亲带我把上百栋瓦房看上一遍。父亲抬头看看太阳，着急地道：“不行，火车快到了！”

他弯腰将我扛在肩上，飞快地直奔火车站。火车站是一座大楼，鹤立鸡群般地耸立于一片低矮的平房当中。阳光照射下，玻璃窗闪烁耀眼的光芒。没等我数完两扇窗户的玻璃，父亲扛着我挤进了候车室，在墙上的一个小洞口前稍作停留，买好车票，扛着我进了站。

火车已经到了。长长的车厢一节连一节，望不到尾，看不见头。绿色的车厢上也有玻璃窗，窗口下方贴一条黄色的窗线，窗线当中挂一块白牌，写着哪里至哪里。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火车，第一次看见车。我的家乡遍地是连绵起伏的丘陵，穿行在丘陵间的是崎岖、狭窄的羊肠小道，连独轮的鸡公车都不能走，人们运送物品都是肩挑杆抬。在此之前，除了摇篮，我没见过任何靠轮子行进的玩意。

冷水滩至高溪市不足20公里，火车很快到站了。下了车，我父亲扛着我向前跑，说是带我去看看火车头。车上的乘客望着我们，有一个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孩子将头伸出窗外，给我父亲鼓劲，挥舞一只手高声叫喊：“蠢子，快跑！”

没跑过两节车厢，“鸣”的一声长鸣，只见远处黑烟和白雾交织着冲天而起，“咣当、咣当”，火车开动了，从我们身边徐徐而去。父亲停下脚步，将我放下地，抚摸着我的脑袋安慰我：“没关系，十五分钟后，我们又能看见一列火车。”那神情仿佛他就是管火车的大官，让我羡慕得不得了，崇敬得不得了，幸福得不得了。

父亲拉着我的手沿铁路往回走。走了没多久，轰隆隆的声响迎面而来，越来越近，越来越响。随着惊天动地的一声长鸣，一列火车向我们疾驰而来。父亲抓紧我站立下来，指着开过来的、吐着火冒着烟的、震耳欲聋的庞然大物，大声吼叫：“快看！”

一列长得让人不敢想象的火车几乎是擦着我们身边飞驰而去。火车头经过时，迸裂的电光、四散的煤渣和红色的巨轮一闪而过，让人眼花缭乱，裹挟着的那股

风几乎将我和父亲掀上车顶。我抱紧父亲的腿，伸长脖子挺立，紧紧盯住火车。火车很快就过去了，快得让我来不及数一数有多少节车厢。一位戴大盖帽的大叔靠住栏杆站在尾车上，一只手抓紧红绿旗扶在栏杆上，另一只手高高举起，向我们挥手致意。

等看不见火车的屁股后，父亲笑着赞叹道：“人怎么造得出来这么一个怪东西！”

等听不见火车的声音后，父亲揉揉耳朵，笑眯眯地问我：“很好看吧？29节车厢。”

我一边连连点头说好看，一边央求父亲坐下来，等待再看一列。父亲望一望西沉的太阳，唱歌一般地道：“保证你以后天天有看，让你看饱，让你看得你自己不想看。我们还要走几里路，还要回去喂鸡、浇菜。”

父亲教书的学校不在高溪市镇上，在离镇上有几里路的肖家祠堂。当时的肖家祠堂是保护得非常好的四合大院，前殿、后殿和两侧的侧殿都是青砖到顶，雕梁画栋，透雕花鸟的门窗，青砖墁铺的天井，红漆大门上钉着拳头大的泡钉，门前两只石狮子。通往村里的路宽宽的，铺满鹅卵石，用不同颜色的卵石勾勒出多种图案，令人赏心悦目。

学校也是我第一次见到的最大的学校，居然有两间大教室，50多张课桌和两位老师。除了我父亲，还有一位潘老师。

这里的风景也是一流的。一条小河在祠堂门前不远处静静流过，流进湘江。河对岸是一抹长满油茶的山岭，四季绿油油。河这边一马平川，平平整整，可以开拖拉机。田块都很大，稻禾一片金黄，几乎分辨不出田埂，仿佛整个田峒就是一块巨大的田。河边两架巨轮水车昼夜不停地悠悠转动，发出“吱吱呀呀、哗哗啦啦”的声响，跟唱歌一样好听。

一切都跟郑家村大不一样，太神奇了！我感觉火车将我送到了—一个书中才有的、神秘而美丽的地方。美中不足的是，站在肖家祠堂看不见火车，架设在门前那条小河上的铁桥也看不见，只能不时听见远处传来汽笛声和轰隆声。

风驰电掣的火车一直在我眼前飞闪，轰隆隆的奔驰声一直在我耳畔回响，我总是幻想自己一直乘坐在火车上，整天懵懵懂懂。就是在睡梦中，我也乘坐在火车上，神奇的火车带我奔向更加神秘、更加美丽的远方。

我很快学会了汽笛声和轰隆声，没事就学火车奔跑。奔跑的时候，我可着嗓门吼叫一声：“呜——！”合着脚步的节奏不停地叫喊，“轰咚、轰咚轰咚、轰咚轰咚轰咚……”我越跑越快，越叫越急，跑得瘫软在地上，张嘴喘气。瘫倒在地

呼呼喘喘之时，我仍然忘不了效仿站在尾车上的那位戴大盖帽的大叔，挥舞一只胳膊，向梦幻中的神秘而美丽的远方致意。

在那神秘而美丽的远方，米饭任你舀，每餐还有两个油汪汪的荷包蛋。

2. 捡萝卜皮

在我来到肖家祠堂之前，父亲在这里已经教了五年书，这里是他教师生涯中待的时间最长的一所学校。他早已经营起了相当规模的副业。住房的屋檐下悬挂两箱蜜蜂；蜂箱下面摆放一只制作精美的木鸡笼，养了七只雪白的来亨鸡；住房的窗外有三块菜地，面积足有两分，用半人高的竹篱笆围住。菜地里种了冬瓜、南瓜、丝瓜、青豆、辣椒、茄子，品种不下十种。只有小半块地是空的，土却整得细碎、平整。

我不敢相信父亲能让地空着，指着半块空地问他：“爸爸，这是潘老师的地吧？”

父亲伸手向一边没有篱笆的、菜叶黄黄的一块菜地一指，得意而又轻蔑地笑着问我：“他能种出这样好的地来？”随即他自己应答：“他，下一辈子吧！”

“那你怎么让半块地荒着呢？”

父亲弯下腰，用一根细细的小棍轻轻地拨开表土，笑容可掬地向我招手：“蠢子，你过来看看，白菜不是发芽了吗？”

父亲不苟言笑，高兴时，或者向子女表示爱意时，他就叫我们叫蠢子。要是他连着叫“蠢子、蠢子”，那就表示他更加爱我们了。我想，之所以中国人聪明，是因为连父亲向儿女表达爱意也这般扑朔迷离，逼着人去猜度，中国人就是在不停地猜测中把脑筋猜灵活了吧？

父亲可没有指望两箱蜜蜂、两分菜地和七只母鸡养活我。每天清早，他蹲在学校门前的一个小水沟前，眉头皱紧，不停地抽烟，似乎在冥思苦想。

虽然祠堂做了学校，但仍然是村民的精神家园。一有空闲，村民们就来走一走，摸一摸门前的石狮子，在课桌上坐一坐，看一看我父亲的鸡、蜜蜂和菜地。

肖支书是这里的常客，几乎每天来一趟。肖支书30岁上下，跟我父亲一般高，比我父亲粗壮，黑红的大脸，黑红的大手。他左胸口袋上挂一支钢笔，一年四季